

故宫博物院所藏商周青铜簋的分期断代

李米佳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周青铜簋大多系传世品，其中不乏重要的精品。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青铜器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此为据，结合院藏商周青铜簋的具体情况，吸取考古类型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青铜簋依照器型、纹饰的特征和演变，再参考铭文内容，排出一个前后有序的系列，以期做到科学断代并和出土器相互印证。本文选择其中对比条件较典型的器物进行分期断代示例。

关键词 传世器 出土器 分型分式 簋 垂珥

国内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已有王世民等三位先生所著《西周青铜器断代分期研究》^{〔1〕}。专门讨论青铜簋的文章，以彭裕商先生的《西周铜簋年代研究》^{〔2〕}为代表，此外刘启益、李丰、张懋镛先生以及日本的林已奈夫先生等也对青铜簋做过不同的分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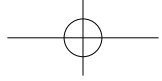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大多系传世品，流传过程较为复杂，部分藏品缺乏有效的整理和研究。宋代和清代的金史学家对其中个别铜器的年代偶有论及，大都依据铭文中的内容与文献记载比附或由历朔推设，缺乏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全面考察。尤其是大量无铭文的藏品，所定年代多不可靠。至于花纹、器形残缺之器，则更缺少断代的依据。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院藏青铜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不但具备可行性，而且可为院藏其它青铜类传世品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的基本状况和研究思路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多为传世品，在世界博物馆同类藏品中独占鳌头。据文物总账统计显示，青铜簋有304件，包括新字号、故字号、少量残器和器盖。因大多是传世品，缺乏相关的出土资料，更有些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改制、增刻铭文，情况较为复杂，一直未能系统地加以整理。故宫博

〔1〕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11月。

〔2〕 彭裕商：《西周铜簋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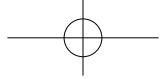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博物院建院近九十年来，曾经展出、编录的青铜簋类藏品，约只占全部同类器的1/10。其中虽不乏重要的精品，但长期以来不为外人所了解，原因就在于有部分藏品在鉴定中尚存争议或未能定性。尤其是器形残缺、无铭文或无花纹的一些青铜簋，缺乏基本的数据和整理，因此不能充分彰显其学术意义。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有一些是传世器，更多的是早年出土的。由于长时间的几经辗转流传，曾经的出土器物已经和传世器等同了，既失去了出土地点的辨认，更无法找到当年伴出的器物和原生环境。因之这些传世器无法确定出土的年代序列，在断代上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经验。至于和出土地点密切相关的青铜文化方面的地域性研究，也无从谈起。另外，其中是否混杂有后代仿古器也是需要仔细甄别和鉴定的。

王国维曾说的“二重证据法”是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1〕}。那么我们面临的则是传世器和出土器的问题，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推陈出新二重证据法。要解决传世器存在的断代、出土地点等问题，需要借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即从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中，选择出土地点和时代均明确的标准器，以此为标尺，与旧藏的传世器在形制、纹饰上作对比，寻找共同点和相似性，从而重新找出传世器当初的时空与地点。这就是本文倡导的以传世器和出土器相互印证为内容的新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断代鉴定方法已为研究者所熟知和采用，尤其是故宫博物院这样以传世器为主要藏品的博物馆，多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尽量找出传世器与出土标准器的共性，对于青铜器藏品的断代、定级、辨伪甚至探讨青铜文化地域性的不同表现及其内在联系，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有铭簋，或依据铭文与器型之关系，本身就可解决青铜器断代中的重要问题；或有些则有可能充实与其同铭或同器主的器群(组)，有益于完整地此类器(组)之组合情况，并进一步深化对断代的认识；或有助于从铭文内容出发去解决重要历史问题。无铭文的器物，其器型与纹饰间也存在有机关系。另有些不常见的器型或残器，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我们对青铜簋的认识。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仅适用于青铜簋，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大量其他传世铜器的整理、研究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的整理、研究虽有上述重要意义，但如何整理与研究，研究水平之高低，都会影响这批重要资料的科学利用。故宫青铜簋多传世器，单靠自身资料难以建立器型发展的构架，虽然可以参考目前已有的青铜器类型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院藏青铜簋进行型、式的划分，以明确科学谱系，但还无法全面展开。因为，现在对青铜器所做的形式学研究成果中，依据研究者各自采用的不同的分型(分式)标准，而有不同的结果与模式，所设标准科学性也有差异，且因考古出土资料缺乏，在各自形式序列中也有缺环。再有就是，西周有铭器物依靠铭文(历日资料)确定时代与形式学序列的联系，也还有更细致的工作要做。所以，对故宫藏青铜簋的整理，已有形式学的研

〔1〕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页2—3，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图一〕专簋



〔图二〕𠩺簋



究成果未必能满足借鉴之要求，需要研究者结合馆藏青铜簋的具体情况，在吸取已有成果的同时，先选取断代对比条件较典型的器物进行分期、断代示例，为以后更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二 分期断代示例

馆藏簋形铜器的数量很多，经过初步排比分析，选取其中形制变化明显的23件进行分型(分式)断代示例。其中商器8件，西周器15件。按其器型可分为三型，即：圈足簋、方座簋、三足簋。这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关于西周簋的分型要少了两型，即没有四足簋和高圈足簋，但在圈足簋中多了一式三耳簋。

I型 圈足簋 19件

圈足簋是簋的最初式样(I型)，出现在商代早期，即二里冈文化期。也是所有簋的基本形式，其它簋都是由此演变派生出来的。考古出土物中，圈足簋其下分式较多，如口部或敛或侈，腹部或深或浅，腹壁或直或斜，有耳或无耳，双耳或四耳等等。故宫博物院藏器式样虽相对简单，但圈足簋的数量在簋类器中占有多数，这与上述“报告集”中I型圈足簋所占的比例是一致的。

1式 无耳圈足簋。侈口，深腹，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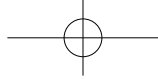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1. 专簋〔图一〕 高12.8、口径20.6厘米。颈饰三周弦纹，足饰两周弦纹。器内底有一字铭文“专”（《集成》2918）。章乃器旧藏。属商代后期。

2. 𠩺簋〔图二〕 高18.9、口径24.9厘米。方口沿，颈饰一周圆涡纹和鸟纹，有三个兽头凸饰间隔，腹饰方格乳钉纹，圈足上饰一周鸟纹。器内底有一字铭文“𠩺”（《三代》6.1.2、《缀遗》6.3、《续殷》上32.7、《善斋》8.1、《小校》7.3.1、《集成》2916）。刘体智旧藏。商后期器。陕西长安张家坡M106西周墓出土有方格乳钉圆涡纹夔纹簋，无铭^①。与之比较，大小几乎相同，但张家坡出土器上的乳钉更长，颈部纹饰上也有鸟纹与夔纹之别。陕西长安张家坡沔毛M1早周墓出土的另一件方格乳钉夔纹簋，无铭，形制特征也很相似^②。从器型分类来看，这件故宫博物院藏器的时代似乎更接近于西周早期，但是圈足上的长尾凤鸟纹和较为平坦的乳钉则具有明显的商后期特点。

3. 癸簋〔图三〕 高12.7、口径12.8厘米。通体以雷纹为地，口下饰蕉叶纹，对称间饰两个凸兽首，腹、圈足饰兽面纹。器内底有二字铭文“癸”（《集成》3089）。1960年北京市文化局调拨，传河

① 赵永福：《1961——62沔西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9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图三〕夔簋



〔图四〕卣簋



〔图五〕古亚簋



南安阳出土。形制近于英国伦敦戴迪野行收藏的旅簋(商后期器)^{〔1〕}、德国科伦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妇姤簋(商后期器)，当为同一时期物。

2式 双耳圈足簋，为圈足簋中最常见的形式。

1. 卣簋〔图四〕 高14.2、宽25.5厘米。颈饰夔纹一周，间饰两个凸兽首，足饰夔纹组成的兽面纹。器内底有3行20字铭文：“辛巳，王饮多亚。……”（《三代》6.49.1、《贞松》4.47、《续殷》上48.4、《小校》7.43.3、《集成》3975）铭文记述，在辛巳这一天，商王宴请众官员及赏赐等事，并以此纪念太子丁。本器曾被称为邕簋、京簋，从铭文内容看显然是不合适的。章乃器旧藏。商后期器。

2. 古亚簋〔图五〕 通高22.4、宽26厘米。形制同上器。有盖，盖中有圆握，握两侧各有一系，盖边饰夔纹。器内底有3行16字铭文：“己亥，王赐贝，在阼。……”（《邶三》上26、《录遗》147.1-2、《集成》3861）铭文记述，在己亥这一天，商王赏赐贝等事，并以此为父己作祭器。传河南洛阳出土，章乃器旧藏。商后期器。

以上两簋形制与铭文内容在时代特征上可互为印证，显示了铭文与器型的内在联系，是一组不用比较，通过自身特征即可解决断代问题的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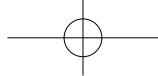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3. 兽面纹簋〔图六〕 高14.1、宽25.6厘米。口下饰一周三角雷纹，颈部饰一周夔纹，两面有凸兽首，腹饰连体兽面纹，兽面中央有扉棱。圈足较高，不折边，饰一周夔纹。双耳上端有耸角兽头，下有钩形垂珥。1946年入藏，原定时代为商后期。与上两器不同，无铭文，无法通过形制与铭文互证判断时代。但是其形制特征，除钩形垂珥外，余皆与北京琉璃河M253西周墓出土的兽面纹簋相同^{〔2〕}。而小钩形垂珥特点，又与陕西宝鸡竹园沟M7西周墓出土的乍宝彝簋之耳同^{〔3〕}。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故宫博物院这件藏器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而非商后期。

4. 枚父辛簋〔图七〕 高18、宽25.1厘米。颈饰夔纹，中间前后有凸起的兽首，腹饰兽面纹，圈

〔1〕 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页315，文物出版社，1995年。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3〕 宝鸡市博物馆、渭滨区文化馆：《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页290，《考古》1978年第5期。



〔图六〕兽面纹簋



〔图七〕枚父辛簋



〔图八〕酈亚父丁簋



足饰夔纹。器外底饰凸起的蟠龙纹。器内底有一行三字铭文“枚父辛”(《三代》6.16.7、《西甲》6.18、《集成》3202)。清宫旧藏，没有出土地点，但纹饰和铭文内容都是典型的商代后期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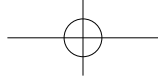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5.酈亚父丁簋〔图八〕 通高23.3、宽30厘米。小环耳，敛口，盖、肩及口下均饰阴刻的涡纹，间饰四瓣花纹，足饰两道弦纹，器外底有一凸起的四瓣花纹。器内底有一行四字铭文：“酈亚父丁”(《小校》7.58、《集成》3310)。1961年国家文物局调拨。形制不典型，与上述诸器均不同。但其铸铭“酈亚”则可归入与其同铭或同器主的器群横向比较。故宫博物院藏同铭器中，除此件簋外，还有鼎、鬲、卣、尊、罍等器形。70年代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了几件带有酈亚铭文的青铜器，从挖掘的墓穴来看，规模都不小，其中一座还是有四个墓道的大墓。加上众多的带有酈亚铭记的器物，说明它们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大族。此外，早年间苏埠屯还曾出土过一些“酈亚器”，也有学者就此推测苏埠屯是酈亚族的墓葬区。商代后期器。

6.易旁簋〔图九〕 高14.3、宽29.2厘米。颈饰垂冠回首夔纹，中间前后饰凸起的兽首，圈足饰长体夔纹。器内底有三行二十四字铭文：“易旁曰：遣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三代》6.51.1、《捃古》2.3.27.2、《从古》12.5.1、《敬吾》下39.2、《周金》3.107.2、《小校》7.46.1、《集成》4042) 铭文记述易旁为答谢遣叔赐给他三串贝和三家奴仆的事，并纪念父丁。郭止亭、方莲卿、刘鹗旧藏。该器著录甚广，流传也经多人之手，一直认为是西周早期器。经与上海博物馆藏的段簋比较，除圈足上的纹饰不同外，余皆极为相似^{〔1〕}。段簋因铭文内容中有一定的时间指向，故可细定为西周中期前段器。似可作为故宫博物院藏易旁簋的时代参照。

7.堇临簋〔图十〕 通高16.7、宽33.5厘米。颈、足饰相间的夔纹和涡纹，中有凸起的兽首，腹满饰兽面纹。器内底有二行八字铭文：“堇临作父乙寶尊彝”(《三代》6.40.5、《西甲》6.32、《续殷》上22.11)。清宫旧藏。该铭记述了堇临为祭祀父乙做此簋。1966年陕西岐山贺家西周墓出土史颉簋，由铭文可知或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二器比较，仅耳部有所不同^{〔2〕}。

〔1〕 图见前掲《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3。

〔2〕 长水：《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图九〕易旁簋



〔图十〕董临簋



〔图十一〕团龙纹簋



8.团龙纹簋〔图十一〕 通高15.8、宽27.3厘米。腹饰两相对的蜗形夔纹，中有扉棱相隔。圈足较高，上饰一周蛇纹，有四条短扉分割。双耳上端有兽头凸起，双角高出器口，下有长方形珥。无铭。清宫旧藏。该器所有形制特点与陕西宝鸡竹园沟M4西周墓出土的蜗夔纹簋一致。

〔图十二〕伯作簋



〔图十三〕斂簋



以上二器通体满饰花纹。由出土器物可知，这种满花装饰年代最晚者，大体在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此后不再见圈足簋有满花装饰。故此二器时代当在穆王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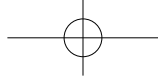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9.伯作簋〔图十二〕 通高14.9、宽29.2厘米。通身以云雷纹为地，满饰凤鸟纹。器内底有一行三字铭文“伯作簋”（《集成》3293）。清宫旧藏，没有出土地点。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西周墓出土斂簋^{〔1〕}，为西周中期穆王前后器。美国纽约萨克勒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静簋，其铭文内容与陕西的斂簋有时间上的关联，也为西周中期穆王前后器^{〔2〕}。故宫博物院藏伯作簋在形制风格上与二者无异，其年代当与之相近。

10.斂簋〔图十三〕 通高17.8、宽29.2厘米。敛口，有盖，器腹向外倾垂甚扁，圈足外撇。体侧有半环耳一对。器、盖均饰横向瓦棱纹。盖器同铭：“唯八月初吉丁亥……斂用从。永扬公休”（《冠卣》上24、《录遗》160.1-2、《集成》4099）。荣厚旧藏。与上海博物馆藏品贤簋^{〔3〕}（传河南出土，西周中

〔1〕 陕西省文化局等：《陕西省宝鸡市出土文物展览》专刊，页2，1975年10月。

〔2〕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2。

〔3〕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5。



〔图十四〕乳钉三耳簋



〔图十五〕荣簋



〔图十六〕豆闭簋



期偏早时器)比较,二者仅在耳部略有差异,当为同时期器。另外从二簋的形制可见双耳圈足簋与下一式环耳圈足簋的关系。

3式 三耳圈足簋。

乳钉三耳簋〔图十四〕 高19.1、宽33厘米。深腹,高圈足外撇,腹外等距饰三兽耳。口下饰目形纹,腹部在菱形格地上饰乳钉纹。清宫旧物,原藏颐和园。三耳圈足簋非常罕见,以致“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簋形器中未有列出。但所饰较为平坦的乳钉纹、兽面纹及目形纹都体现了商代无耳簋的造型与纹饰特征,与上述I型1式第2器相近,不同的是多了三个兽形耳。法国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三耳簋(史簋),较本器略小,唯垂珥有异^{〔1〕}。皆为商代后期器。

4式 四耳圈足簋。器前后左右对称各饰一耳。

荣簋〔图十五〕 通高14.8、宽28.8厘米。浅腹,四兽耳高出器口,有长方形垂珥。腹饰圆涡纹和夔纹,高圈足饰兽面纹。器内底有5行30字铭文:“唯正月甲申,荣格……”(《三代》6.49.5、《西甲》6.42、《集成》4121)清宫旧藏。除耳部外,器型、纹饰与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出土的矢簋^{〔2〕}(西周早期武王、成王时器)极为接近。耳部与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大保簋^{〔3〕}相似(传山东出土,西周早期成王时器)故本器亦应为西周早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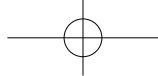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5式 环耳圈足簋。此式均有盖,盖、器通饰横向瓦棱纹,兽头耳衔环。

豆闭簋〔图十六〕 高15.1、宽32.5厘米。斡口,腹侧有兽耳衔环。满饰平行的瓦棱纹。器内底有9行92字铭文:“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格于师戏于大室。井伯入佑豆闭……”(《三代》9.18.2、《憲斋》10.10、《奇觚》4.15、《周金》3.26、《大系》60、《小校》8.65.2、《冠甬》上25、《集成》4276)传西安出土,辗转传流于潘祖荫、盛昱、多智友、荣厚等多人。该器断代在铭文和器形上有迹可寻。铭文

〔1〕 图见前揭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页316。

〔2〕 《江苏省五年来出土文物展览会》专刊,页1-3,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主办,1955年。

〔3〕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59。



〔图十七〕絺簋



〔图十八〕太师虘簋



〔图十九〕不寿簋



中井伯作为右者的内容还在多器上出现过，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师虎簋^{〔1〕}（懿王前后器）、《西清续鉴甲编》中的走簋（恭王前后器）及师毛父簋、利鼎等。器型与1959年陕西蓝田寺坡村出土的询簋^{〔2〕}（恭懿时器）、1974年陕西扶风强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即簋^{〔3〕}（恭懿时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乖伯簋（懿王前后器）等器相同，应是同时或年代相近之器。故该器断代可由原来笼统的西周中期，详考至恭懿时期。

6式 附耳圈足簋。双附耳，器形似盂。

1. 絺簋〔图十七〕 通高19.2、宽24.5厘米。盖与器有子母口相合，器腹两侧有附耳一对。盖、器通饰横向瓦棱纹。盖、器对铭，各5行44字：“唯十又二月既生霸丁亥，王使荣蔑历令封邦……”（《三代》8.49.1-2、《两罍》6.24、《从古》6.23、《清仪》1.37、《掇古》3.1.22、《窰斋》11.14、《小校》8.45.2、《集成》4192）吴云、张廷济旧藏。器型同于上述3式簋而作附耳，亦属西周中期器。

2. 太师虘簋〔图十八〕 通高20.7、宽30.2厘米。盖、腹饰直列瓦棱纹，双耳作兽头状。盖器同铭，各7行70字：“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集成》4251）国家文物局调拨，传1941年陕西西安出土，一对，另一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与以上诸器均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将此器列在附耳圈足簋一式，考证为西周中期约当孝王前后器^{〔4〕}。今从，不再赘述。

3. 不寿簋〔图十九〕 高15.8、宽33厘米。侈口，腹壁略直，双附耳。颈饰以云雷纹为地的窃曲纹。器内底有铭文4行24字：“唯九月初吉戊辰，王在大宫。王姜赐不寿裘。对扬王休，用作宝”（《集成》1794）。清宫旧藏。因铭文中有王姜出现，论者常把其定为西周早期昭王时器。但以所饰窃曲纹论^{〔5〕}，宜为西周中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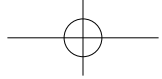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1〕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7。

〔2〕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弥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3〕 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4〕 图见前揭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70。

〔5〕 《吕氏春秋·适威》：“周鼎有窃曲（一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图二十〕作宝彝簋



〔图二十一〕格伯簋



II型 方座簋 2件

方座簋是簋形铜器的第二种型别(II型)。所谓方座簋,就是将簋体和方座连铸在一起,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其演变发展直至战国以后。西周方座簋可按耳的多少和样式分为几式,但故宫博物院藏器仅双耳方座簋一式。

1式 双耳方座簋。方座簋的主要形式,有盖或无盖。

1.作宝彝簋〔图二十〕通高25.5、宽30.7厘米。侈口方唇,鼓腹,圈足下有方座。兽耳高出器口,垂珥较低。腹和方座饰凸起的大兽面纹。器内底有一行三字铭文“作宝彝”〔集成〕3266)。(清宫旧物,原藏颐和园。1976年3月陕西临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处西周铜器窖藏,出土有利簋,据其铭文可定为武王时期器^{〔1〕}。作宝彝簋与其形制无异,铭文字体相近,故也可定为西周早期武王时期器。

2.格伯簋〔图二十一〕通高23.5、宽30.8厘米。颈饰夔纹和圆涡纹,前后中间铸凸起兽头。兽耳下端似象鼻卷曲。腹饰直棱纹,方座饰直棱纹并围以圆涡纹和窃曲纹。器内底有8行83字铭文:“唯正月初吉癸巳……”(《三代》9.15.1、《十六》2.1.1、《怀米》下28、《掇古》3.1.82.2、《窑斋》9.16.1、《敬吾》下8、《周金》3.30.1、《大系》66.2、《小校》8.64.2、《集成》4263)1958年收购,钱坫、曹秋舫旧藏。铭文内容记录了以物易田的交易,此类铭文内容,多见于西周中期恭王前后器。格伯簋现存世三件,另两件在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互为印证。

2式 附耳方座簋。“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关于方座簋的分式有此一式,故宫博物院此类藏器极少,形制变化不成体系,本文此处暂不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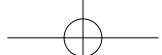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III型 三足簋 2件

簋的第三种型别是三足簋(III型)。特点是在圈足簋的下面再加三足。西周初期,与三足簋并行的还有四足簋,但发展历史较短。“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虽有四足簋的分型,但可作比对的材料不多,故本文暂不涉及。

1式 三足簋中最常见的形式。圆形鼓腹,双兽头耳,圈足下有三兽形短足。盖、腹饰瓦纹,盖边、口下及圈足上多饰窃曲纹或重环纹。

师酉簋〔图二十二〕通高23.5、宽30.8厘米。盖、腹饰瓦纹,盖边、口下及圈足上饰重环纹。盖器同铭,11行106字:“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三代》9.21.2、《积古》盖6.23.1、《掇古》器3.2.28.2、《两壘》盖6.15.1/器6.17.1、《窑斋》9.12.1、《奇觚》盖4.22.1-2/器4.24.2、《古文审》7.11、《周

〔1〕 《文物》特刊34,文物出版社,1977年7月20日。



金》3.20.2、《大系》76.1-77.2、《小校》8.69.2-70.2、《集成》4288)阮元、吴云、金香圃旧藏。此类形制、纹饰器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均有收藏。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青铜器窖藏也可见类似出土^{〔1〕}。均为西周晚期器。

故宫博物院藏器中属于此式的还有著名的颂簋、仲栴父簋等，不同的是它们的盖边、口下均饰窃曲纹，同属西周晚期器。

2式 环耳三足簋。基本是在1型5式环耳圈足簋下加三足而成。

扬簋〔图二十三〕高18.7、宽21.6厘米。腹饰瓦纹，口下及圈足上饰窃曲纹。足尖上卷似象鼻。器内底有10行107字铭文：“唯王九月既生霸庚寅，王在周康宫……”（《三代》9.25.1、《邃斋》11.16、《周金》3.24.1、《大系》102.1、《小校》8.72.2、《集成》4295）1957年收购于上海。除上扬的卷足外，器型、纹饰与1977年陕西澄城出土的王臣簋^{〔2〕}（西周中期孝王前后器）相近。196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五年师旂簋^{〔3〕}（西周中期夷王前后器），其足与扬簋之足一致。故扬簋年代应与二器相近，属西周中期器。

〔图二十二〕师酉簋



〔图二十三〕扬簋



三 小结

商周青铜簋发现日多，大都可以根据出土的地坑、形制、组合确定其年代的早晚，有的甚至根据铭文还可推断其所属的王世。因此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簋的年代可以据此排定。本文从故宫藏商周簋中选取23件进行分型分式，共分为三型9式。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与出土器和其它博物馆藏器进行横向比对，力求寻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簋的出土地域风格，并表现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圈足簋（商早期至西周中期）、方座簋（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和三足簋（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大体是一个顺序演变的过程，每一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但在器型上又都继承了上一期的传统，纹饰装饰也是如此。具体情况如下：

殷商前期簋形似碗，无耳或有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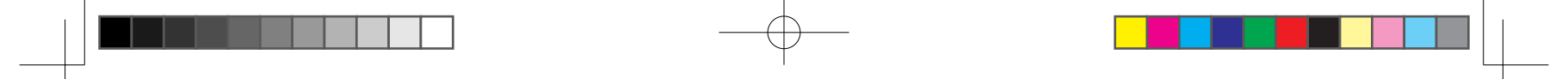
殷商后期，第一阶段一般仍无耳。第二阶段，带有圆细双耳的簋开始增多，有些还附有珥^{〔4〕}。出现了个别的三耳簋。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98。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5年。

〔4〕 大耳下的小附耳，以长方形或勾形为多。



西周前期簋多垂腹，兽耳常高出器口。出现双耳或四耳的方座簋，前者如利簋，后者如宜侯矢簋等。

西周后期垂腹双耳簋仍可见。但宽身矮体，多有盖，斂口，兽耳衔环，圈足下附三足的簋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样式^{〔1〕}。

另有一些故宫藏器也是递嬗特点清晰，风格鲜明的，如鬲簋(西周中期前段器)、追簋(西周中期器)、颂簋(西周晚期器)、谏簋(西周中期孝王前后器)、仲栒父簋(西周晚期器)等。它们或是形制与示例器物类似，或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已有采用，本文不再赘述。

附录:文中引用金文著录简称对照表

简称	全名及相关信息
十六	(清)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嘉庆元年(1796)。
三代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
大系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8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
小校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8卷，1935年。
从古	(清)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16卷，光绪十二年(1886)。本文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报馆石印本。
古文审	(清)刘心源《古文审》8卷，光绪十七年(1891)。
贞松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1930年。
西清	(清)王杰《西清续鉴甲编》20卷，乾隆五十八年(1793)，本文采用宣统二年(1910)涵芬楼石印宁寿宫写本。
怀米	(清)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2卷，道光十九年(1839)自刻本。
两罍	(清)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12卷，同治十一年(1872)自刻本。
邶三	黄濬《邶中片羽三集》2册，1942年。
周金	邹安《周金文存》6卷，1916年。
奇觚	(清)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20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
冠罍	荣厚《冠罍楼吉金图》4册，1947年。
录遗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1957年。
积古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嘉庆九年(1804)自刻本。
捃古	(清)吴式芬《捃古录金文》3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吴氏家刻本。
清仪	(清)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10卷，1925年涵芬楼石印本。
续殷	王辰《续殷文存》2卷，1935年。
缀遗	(清)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1935年涵芬楼石印本。
集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90年。
善斋	刘体智《善斋吉金录》28册，1934年。
敬吾	(清)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2册，光绪三十四年(1908)朱之溱石印本。
窳斋	(清)吴大澂《窳斋集古录》26册，1919年涵芬楼初版石印本。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张 露)

〔1〕 参阅杜廼松：《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